

追回的时间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近代时段”

方书生

经济地理学的萌芽时期强调其知识积累的历史性,正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来建立这一学科,但是,随着空间分析与区域科学的进一步融合,学者们愈来愈重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面向,却又忽视了时间与制度的面向,近年来虽已经增强了对制度与文化的关注,但时间维度的缺失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要“追回时间”。

我们的午餐来自哪里?大米可能来自东北或东南亚,蔬菜可能来自山东或安徽,牛肉可能来自内蒙古或澳洲,水果可能来自城郊或美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来源地图极其复杂。让我们再想象一下50年前、100年前,他们的午餐又来自哪里?有哪些增加或减少?也许,对当下的一位食者而言,无需知道这么多现在与过去,只要拿出货币支付即可享用,需要关注的不过是口袋中货币存量而已,然而,在另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与空间有关的资源与要素的生产与流动,也许就是不甚准确的“经济地理”。在时空之间、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之中、在产品生产与价值流动之中,形成一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循环“链”,在这个循环的空间里,只有方向没有尽头,只有新陈代谢没有持续不变。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时空之旅,它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哪里?

伴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后商业贸易与地方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地理有关的知识,既有利于列强推进殖民计划,又有利于商业机构具备超越其竞争对手的潜在优势,于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力,从不同学科中来的知识在19世纪前期逐渐融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地理学”,得以总结并解释当时的空间经济增长与组织形态,及至1930年代,“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

不过,对于什么是“经济地理”?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在《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克拉克(G. L. Clark)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地理学还没有确定的研究大纲,也没有令人信服的

关于恰当的研究范畴的论述”;斯科特(A. J. Scott)亦认为:“任何对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容易带有历史随机性。”众所周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地理学”这面旗帜下一度出现众多不同的标签,分别代表着不同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景下的解读。原因在于,“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以空间作为研究对象,但同时具有时间性,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多尺度的空间维度,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一体两翼。

然而,在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一度出现时间维度的缺失,以至于近年来地理学界一直在呼吁长时段经济地理学分析的重要性。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让我们回到近代中国,回望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史,看看“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时间”是如何“丢失”的?

经济地理学的形成及其中国成长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运输技术的改进、工业生产的出现、劳动分工的扩大,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种类大幅增加,促成了商业地理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界开始探索生产、消费、财富的空间分配,以及贸易的空间形态;地理学界则进行旅行与探险,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新发现地区获取自然景观、土地利用、聚落、社会及政治组织等资料。

1760年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首次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概念,认为研究经济必须与地理结合起来。18世纪以来的经济实践、观念、话语,以及学者对商业革命、产业革

命后地方化经济特征的解释,共同构成了“经济地理学”的背景。1860年以后,随着新经济与地理的重大变迁,产生了经济地理学的话语:例如“生产区”、“南北轴”;对世界进行有组织的分类;寻找经济地理联系的新地图与图标;创造了一些新的名称,例如“商业空间”、“交易中心”。特雷弗·巴恩斯(T. J. Barnes)在梳理1889—1960年英美经济地理学评论道:很难准确地说明“经济地理学”是何时被创造,相关的证据有:1826年杜能(Thunen)的《孤立国》、1882年高兹(W. Gotz)区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任务》)、1893年康奈尔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首次开设经济地理学课程、1925年《经济地理》杂志首次出版。

再来看经济地理学“中国化”及其贡献。自19世纪中叶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即传入中国,李希霍芬(F. Richthofen)在1868—1872年间对13个省进行了地理考察,收集相关的经济、商业情报。1898年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查,在1907—1920年出版《支那经济全书》与《支那省别全志》。1906—1911年清政府亦仿照东西方,由民政部、度支部、商部、农工商部进行人口、财政、农业、矿藏调查。

对其时中国而言,近代意义上的商业地理或经济地理的知识是外生的,用来描述或理解其时的中国经济。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中国新出现的商业书,以及大量对于经济物产、交通、农工商等的调查,大抵上仍是商业地理学框架下的碎片化知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地理成果出现于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其时国内经济地理学界进行了人口、土地、农业及地区的经济地理调研与综合性考察,其中著名的研究有:胡焕庸对中国人口、交通、农业、商业;沈汝生对都市与人口;任美镔对中国

工业区位、翁文翰对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观察实验所获得的事实为基础,加以经验归纳和科学演绎”。此外,前苏联的中国经济地理与世界经济地理著作也由上海光明书局翻译出版,冯达夫等译编《经济地理学大纲》。至此,“经济地理学”概念逐渐流传开来。

大约到1940年代后期,在学科建设方面,全国10所大学地理系形成了系统讲授经济地理学的课程;在科学实践方面,完成了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边疆勘察、地区性综合考察等方面的调查,并过渡到从经济地理的视角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张其昀、王金绂、陆象贤、胡焕庸、葛绥成以“中国经济地理”为名完成著作,对自然地理、各产业部门、人口、城市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总结,其中葛绥成分经济地理的概念与特征、经济地理学的要素、各经济部门、要素流动四个方面阐释经济地理。

民国时期所进行的调研与研究,重心从地理描述转向了解释空间分布,尤其是人文活动的分布,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描述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故而,其时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特征的描述或解释,而非理论方面的发掘与创新,在学术研究深度上略有不足。

中国经济地理学“近代时段”被遗忘

进入1950年代,经济地理学发展迅速,逐渐舍弃之前的传统——以野外实习为基础、类型学描述为手段,代之而起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抽象化的理论词汇,采用计算器、数据分析等手段,不再满足于对区域独特性的描述与解释,试图寻找经济地理变化的原因。不过,曾

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内完成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却偏离了这一思路,基本上按照前苏联的产业与区域分类进行,研究生产力布局,关注建国以后区域地理出现的新变化,从资源、产业、交通、城市等要素入手,调查各区域的经济地理状况。

在计划经济的规制下,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是“以任务带学科”。这导致即使在1983年孙敬之主编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里,在总论论述工业、农业、交通地理时,仅用很少的篇幅描述近代时期的情形以为背景。即便到1990年代,孙敬之、刘再兴等编著《中国经济地理概论》时,论述近代经济布局变迁的篇幅也不过5%。除了经济地理学学科的“现实效用”价值取向以外,也许,当时对中国经济地理的“当代时段”尚且未能深入讨论,遑论对于中国经济地理的“近代时段”进行历史研究,更是忽略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历史时间性。

作为人文地理学丛书收录的唯一历史地理学的专著,2001年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在有关经济地理的篇幅中,仅0.6%的篇幅论述近代时期。专门的近代经济地理著作也一度阙如,偶得冠以“近代经济地理”的论文,不过一些近代经济空间现象的简论。学界不再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代”经济地理,于是,经济地理学中“近代时段”的研究已经缺失,中国经济地理学中的“长时间”已经缺失。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保留下来的“种子”

尽管囿于理念之差,“经济地理”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研究无所作为,但一部分历史学者发现从“口岸—腹地”的空